

研究报告

2020 年第 16 期

2020.06.30

执笔人：姚天宇

tianyu.yao@icbc.com.cn

《民法典》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机制及其启示

——《民法典》系列研究之二

要点

- 《民法典》将个人信息视为一项民事权利，属于人格权益范畴，与隐私权既具有区别又具有密切联系，适用隐私权保护条款。。
- 《民法典》划定了个人信息的界限，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将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行为均视为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并加以规制。
- 商业银行保有大量个人信息，在《民法典》实施后可能面临巨大的个人信息查询压力和诉讼压力，有必要积极建立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权为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民法典》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及其启示

——《民法典》系列研究之二

一、《民法典》就个人信息保护规范概述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个人信息不再单纯属于隐私权范畴，而逐渐成为企业、社会组织、国家机构的数字资源。因此，个人信息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加以立法保护，如欧洲联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个人信息过度收集、无序传播、随意泄露等问题。2019年底，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集中查处和整改了100款违法APP，其中包括光大银行、天津农商银行、天津银行等金融机构^①。我国《民法典》从个人信息的法律地位、保护原则和个人信息处理者法定义务三个维度规范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一）《民法典》确立个人信息的法律地位

个人信息保护首先是民事法律规范体系调整和规制的范畴。在大数据时代，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能力极弱，在使用互联网、智能设备、APP等媒介时，个人信息势必被收集、整合、分析、使用；与此相对应，互联网提供者、大型

^① 参见 https://www.sohu.com/a/358547475_119666?scm=1002.44003c.fe021c.PC_ARTICLE_REC，2020年6月24日访问。

企业出于巨大商业价值，更加倾向于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通过个人信息研究分析降低自身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为有效平衡个人与企业（或社会组织）之间的不对等状态，《民法典》用多个条款规制个人信息保护。一是明确了个人信息属于民事权利范畴。《民法典》在总则编民事权利章写入个人信息保护条款，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①。二是明确个人信息属于人格权范畴，是一种人格权益。个人信息在不同民事主体看来，可能属于财产权（企业等经营性组织视角），亦可能属于人格权（自然人视角）。《民法典》明确地将个人信息划定为人格权范畴，由人格权编加以调整和规制。三是界定个人信息的范畴。个人信息专指自然人所享有的、能通过该信息区分和识别不同自然人的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②。

（二）《民法典》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合理适度利用显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单纯地强调个人隐私至上的保护模式不仅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可能引发企业隐蔽式地滥用个人信息。为此，《民法典》在坚守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时，也

^① 参见《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

^② 参见《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

对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加以维护。《民法典》一是使用个人信息“处理”的概念，将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行为均视为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二是确立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即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三是承认并保障自然人的同意权，即处理个人信息必须取得该自然人同意且处理行为始终处于该同意的合理范畴内。四是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作为平等保护客体，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提高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层次。

（三）《民法典》强化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义务

有学者指出，个人信息实质上是一种“信息自决权”^①。因此，个人信息在本质上具有隐私权属性的同时，也随着数字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具有交互等经济价值。为此，个人信息处理者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须承担起信息处理职责，主要表现为：一是个人信息处理者须承担为自然人提供查询、复制、更正个人信息的义务，从而使自然人了解何种个人信息被采集或使用。二是个人信息处理者须采取技术手段保证个人信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确保个人信息不会非法泄露。三是规范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免责事由。个人信息处理者只有为维护公众利益、维护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在该自然人同意范畴内实施的行为才能作为免责事由。

二、《民法典》对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信息保护的启示

^① 参见张忆然：《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权利变迁与刑法保护的教义学限缩——以“数据财产权”与“信息自决权”的二分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不仅需要以《民法典》的成文法形式加以立法保护，还需要社会各界在守法过程中的具体行动。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概念的出现，使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不断凸显出来。2020年3月，中信银行未经客户本人同意，违规将该客户个人交易明细交由第三方掌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案件凸显出部分商业银行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存在制度缺陷。

（一）正确认识《民法典》实施后的商业银行在个人信息领域面临的法律风险

一是个人信息保护可能会成为新的民事诉讼案由。《民法典》实施以前，就金融领域而言，个人信息保护一般处于行政法律体系和行业自律规范体系的规制范畴，商业银行更多地承受行政机关（即金融监管当局）或行业协会的压力，如《商业银行法》的为存款人保密原则，《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的保护客户身份和交易信息条款，《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的保护客户隐私条款等。商业银行在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失当时，将会面临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民法典》实施以后，商业银行由于具有客户人数众多、经营范围广泛、经营地点遍布全国等特点，极易面对数量庞大的客户自发性诉讼活动，部分客户也会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实现自身诉求的手段。

二是商业银行可能面临巨大的个人信息查询压力和信息来源合法性说明。商业银行在以往的经营活动中，通过自

身渠道或第三方渠道收集和存储了大量个人信息。如果仅从《民法典》文本角度理解个人信息界限，健康信息和行踪信息可能会成为查询重点；但如果采用扩大解释的理解方式，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中列举的个人金融信息均可能成为被查询对象，如个人虹膜数据、纳税额、担保情况等，均可以成为个人查询对象。《民法典》赋予了自然人查询个人信息的权利，商业银行保有的大量个人信息可能不再成为自身内部使用资源，而将需要完整地呈现于自然人面前，并向自然人说明获取来源的合法性以及处理过程的合法性。

（二）积极建立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

一是完善个人信息处理和告知模式。商业银行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加大对信息安全的宣传力度，提高自然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须在个人信息收集过程中，充分以明示方式向客户列举其可能被收集、采集、整理的信息范围，获取客户同意，规范客户信息使用界限，确保处理过程始终处于同意的合理范畴之类；须在内部设立个人信息处理主管部门，打破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信息界限，实现个人信息统一保护；须建立个人信息告知制度，以电子化、可视化的方式向客户呈现本行所掌握的个人信息，提高回复效率，提供异议修正渠道，畅通权利救济通道，便于客户实现其知情权和修正权。

二是提升技术手段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须广泛采用防火墙、数据加密、数据备份等手段，提升数据存储的安全性，

确保客户敏感个人信息处于保密状态；须加强对个人信息传输过程安全性的管理，在将个人信息传输至商业银行集团外部第三方合作商时，妥善使用“去个人化”处理方式；分类保护不同敏感层级的个人信息，实现统一平台多层级管理；合理使用“技术中立”原则，拒绝将非法获得的个人信息纳入商业银行数据库。

三是培养员工保护客观个人信息意识。完善的制度最终需要人来执行。中信银行案件表明，员工的合规意识、风险意识是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得以最终落地的保证。要加强对员工合规意识的教育和培养，以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作为典型事例，最大限度降低员工的违规冲动；要搭建违反个人信息保护行为的揭发和举报机制，使每一个员工都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者。

（执笔：姚天宇）